

古典经济学纲领与经济学革命的来龙去脉

——用经济学方法论做辩证分析

桂起权

摘要：经济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研究纲领是：(1)以重商主义纲领为正面，则斯密革命为其反面，而穆勒综合则为两者的合题；(2)以劳动价值论纲领为正面，则边际革命为其反面，而马歇尔综合则为两者的合题；(3)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正面，则凯恩斯革命为其反面，而新古典综合则为两者的合题。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史 研究纲领 科学革命 辩证综合

一、经济学逻辑与经济学史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把科学史(包括经济学史)看成“纯逻辑本身的实验室”。认为“它从具体事物中展示逻辑，从行动中展示逻辑，并展示与想象和目的密切结合的逻辑”。这一论断对于经济学逻辑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它提醒他们应当从逻辑的观点关注经济学史。

我们在“全国经济逻辑创新研讨会”(2002年11月，天津)上，提出了经济学逻辑的科学逻辑研究模式，强调了科学逻辑与科学哲学在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作用。本文将这一理念具体应用于经济学思想史，用以分析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研究纲领和最重要的经济学革命的来龙去脉。有点不同的是，本文在对经济学方法论与科学逻辑模式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注入了辩证逻辑的理念，从而使得科学逻辑与辩证逻辑这两种模式或理念融合起来。

若要问：经济学的逻辑或方法论与经济学思想史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回答是：经济学方法论(即广义的经济学逻辑)之与经济学思想史，犹如科学方法论(即科学哲学)之与科学思想史。正如拉卡托斯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拉卡托斯在处理科学史材料时所用的编史方法论，就是他的科学哲学，也就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既然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学逻辑，就是科学逻辑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应用，是经济学理论的元理论，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分析，那么我们在处理经济学思想史材料时，所用的编史方法论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学逻辑。再引申一点说，即按辩证模式重新理解的经济学方法论。例如，在科学思想史上相互矛盾的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动力。同样，经济学思想史上相互矛盾的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也是推动经济学理论进步的动力。这些都符合“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辩证观点。再如，在经济学理论中检验不能只看经济理论与观察事实双方的争斗关系，而应看成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与观察事实三方面的争斗关系。而且每一观察事实之中，都渗透着理论观点，经

验证据经常是受理论“污染”的。所有这些论点也都包含着辩证思维的要素。还有，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理论也往往需要经过反复较量，无论确证或证伪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都要通过漫长的矛盾斗争的历史过程最后才见分晓(这也是符合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因此，旧的研究纲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随时都可能发生。此时就出现否定之否定现象。与此相关，立竿见影、非此即彼的“判决性实验”对经济学纲领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里所谓“判决性实验”是指为了在关于同一论题的相互竞争的纲领和理论之间作出生死判决(确证一方同时证伪另一方)而设计的一种实验。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很难说相互竞争纲领中的哪一方绝对的对，哪一方绝对的错。更常见的是，互斥又互补的纲领不断进行整合。所有这些概念都应当按辩证方式加以理解和重新解释。

二、经济学前史中的竞争纲领 ——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

在经济学史上，对市场经济或现代生产方式最早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这种研究纲领，它是作为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而出现的。无论从逻辑上或从历史上说，在同一论域都可以允许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存在成对的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初创时期，同样存在着相互对立且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其中最有代表的有两个：一是重商主义(16-17世纪)，二是重农主义(18世纪)，重商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

实际上，在经济现象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二者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辩证地相互作用的。但是在经济学史上，重商主义纲领只看到流通过程对国民财富积累的意义，而相对忽视了生产过程。反之，重农主义纲领则看到“纯产品”(“剩余价值”概念的前科学表述)并不能产生于流通过程本身，而只能产生于生产过程。当然，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然而，重农主义纲领却是把生产过程只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轻视了流通过程的作用。这里所讨论的是生产与流通这对辩证矛盾以及两大学派对它们的片面认识。另外，还有一对矛盾是“国家干预”和“自然秩序”这两者的辩证关系。重

重商主义纲领由于它的最大特点是把财富等同于金银,认为财富来源于对外贸易的顺差。因此,它强调国家应该干预国民经济。相反,在重农主义纲领的拥护者中则流传着一句至理名言:“自由放任,世界会自己运行。”重农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原本存在着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指的是财产、安全和自由,若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说,在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自动调节”机制。总的说来,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种研究纲领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是各有其合理性又有其片面性,换句话说两者互斥又互补。

三、古典经济学范式确立时期 ——从“斯密革命”到“穆勒综合”

1. 斯密革命:重商主义的反题

作为伦理学家同时又是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无疑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分别于1759年和1776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表面上看前者所持的人性观是利他主义的,后者所持的人性观则是利己主义的,似乎存在着矛盾。其实“利己”与“利他”两者完全有可能在更高的观点中协调起来。若用现代博弈论(对策论)的观点做重新解释,利己与利他之间并非简单的固定不变、非此即彼的关系。即使双方都从利己的动机出发(每一理性经济人都是以最小的代价来追求最大的效益),其结果仍可能是利他的,或者是既利己又利他的,也就是互利的。所谓“双赢博弈”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从辩证逻辑的眼光看,利己与利他不是固定范畴,而是流动范畴,两者可以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亚当·斯密在对重商主义纲领中“国家干预”观点的批判性研究中,提出了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新概念,突出了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提出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概念。这就确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既吸取了重农主义重视劳动生产的合理观念,又克服了它只注重农业生产的狭隘性。借用库恩“科学革命论”的眼光来看,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发展成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范式”,为古典经济学家确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甚至暗暗规定了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从而吸引了一大批拥护者。史称“斯密革命”。

2. 李嘉图扩展

在斯密范式建立以后,作为“常规科学”的古典经济学研究主要表现为解决一个个具体疑难问题的活动,也就是为实现“范式”的最初纲领而进行的扫尾战。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是在斯密范式的规定下工作的,他在经济学中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常规科学”研究的范畴。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衣钵,坚决鼓吹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反对国家干预。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他提出了各国应按“比较成本”进行国际分工,其核心就是“两优取重,两劣取轻”,具体地说,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成本”的大小,即专注地生产那些不利较小,优势较大的产品,然后通过贸易相互交换,这样可以使劳动配置合理,在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

下,增加生产总额,对贸易各国均为有利。这也就是博弈论中的“双赢博弈”。李嘉图的学说启示我们,输和赢(赚或赔)的关系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贸易的结果必定是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而是做的好的话可能双方都赢,做的不好的话可能双方都输。所以输与赢的关系是微妙而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单纯从形式逻辑观点看,输与赢是固定范畴,输是赢的反面,赢是输的反面,两者相互否定。然而,从辩证逻辑观点看,输与赢都是流动范畴,不是固定范畴,它们是能动地可转化的。

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主要科学功绩在于,他在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的同时,进一步对劳动时间的概念作了澄清,区分了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时间。但是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实际上遇到了两个难以对付的“反常”(矛盾)。第一个反常是价值规律和利润之间的“矛盾”,如果资本家雇佣工人时,的确以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作等价交换,则利润便无从产生。第二个反常是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的规律相矛盾。然而李嘉图对此却几乎视而不见。从逻辑观点看,这里已经涉及到“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问题。其实,李嘉图所碰到的“矛盾”斯密早已有所认识。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的理论》中分析了斯密在研究价值规律时所碰到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实质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商品是按照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交换的,这就是等价交换原则。当斯密分析简单商品生产时,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他转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情况就复杂了,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使他进退维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感到,从决定商品交换的规律(价值规律——引者)中很难引申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后者显然是建立在同这一规律完全对立和矛盾的原则上的。”直到马克思创造性地引入“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这一辅助假说之后,上述两个“反常”才顿时被“消解”了。不论马克思以前的斯密、李嘉图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不了解,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这种商品的秘密在于他能创造比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要的更多的价值。因而马克思指出,这种商品(劳动力)仍然是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交换的。这样,由于引进“辅助假说”,即通过对理论的“保护带”的调整变形,马克思成功地消解了“反常”的事实,维护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假说。

斯密只是感觉到了现实的矛盾,但他不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说明它,因此他在矛盾面前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际上,斯密已经充分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价值规律相对于简单商品生产也是随着劳动条件的独立化产生了某种变化。马克思指出:“斯密的功绩在于,他强调指出了下面这一点(而这一点也把他弄糊涂了):随着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发生了一个转变,价值规律似乎变成了(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变成了)它的对立面。”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似乎”是指,简单商品生产下的价值规律不再成立,它意味着整个价值规律失去普遍有效性。而马克思所说的“确实”则是指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旧的价值规律已经通过辩证的否定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新的价

值规律。

斯密与李嘉图对待上述“矛盾”或“反常”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斯密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他不能自圆其说。李嘉图则在自己的观点中竭力维护劳动价值论,他的经济理论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包括在这里。他对他所不能合理解释的现象作为例外(例如酿酒)而搁置一边。然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宁愿重视亚当·斯密,因为斯密在他的理论的逻辑矛盾中看出了试图了解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形。这是有积极的探索意义的。

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在这方面不如斯密,因为他甚至没有察觉问题的存在。而亚当·斯密凭借他的正确的本能已经认识到这个“矛盾”是不可忽视的,尽管他还不能解决它。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的这一部分史料说明这样一个辩证的道理,即在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深化及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从辩证逻辑观点看,发现“矛盾”是探索事物的某些前所未知的特性、方面和规律的先导。

3. 穆勒综合(重商主义与斯密革命的合题)

由于约翰·穆勒的经济理论是全面系统地吸收了和综合了前人成果,因此,曾长期被看作李嘉图之后正统经济学的最大权威。在经济学理论上,约翰·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把斯密的生产费用说、詹姆斯·穆勒的工资基金说、西尼尔的节欲说、李嘉图的地租说等等来一个理论上的大综合。在经济政策上,穆勒赞成自由放任与适度的国家干预相结合。

李嘉图和穆勒对待上述“矛盾”的态度又有所不同,李嘉图看到事实情况和矛盾,却认为它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他牢固地站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所以他把矛盾的事实作为例外情况来处理。相反,穆勒却是这样做的:如果事实与逻辑发生矛盾,那么更倒霉的该是事实。对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做出了如下的评价:“穆勒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李嘉图理论的人,虽然他的阐述只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轮廓。他力求做到的,是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因此’,从他这里也就开始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请不要误以为马克思轻视甚至否定形式逻辑的一贯性。马克思的真意在于指出,通过抹煞矛盾、掩盖矛盾来强求逻辑一贯性,不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马克思本人通过对所发现矛盾做出正确评价而消解了矛盾,同时真正做到了维护形式逻辑的一贯性。我们只是说,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人为地追求表面的无矛盾性并不可取。

四、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1. 边际革命:劳动价值论的反题

187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属于瑞士洛桑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耳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开始了边际革命。诚然,主观与客观本是一对辩证矛盾,其间存在着两极张力。在经济学史上有关价值理论,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即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论。劳动价值论偏重于研究客观上劳动的消耗,相对地忽视对主观效用方面的考虑,因此不能合理解释比如消费者行为的主观评价成份。例如,劳动价值论碰

到一个明显的“反常”事实,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缺性相关,由于存在着稀缺性,因此对各种产品用途的主观估价就会存在效用递减。与此相应同时存在价格递减,可见主观、心理的评价能影响并决定商品的价格。因此,边际主义者提出效用价值论,同时引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法。在数学上则采用与之相匹配的微积分方法。大家知道,微积分是变量的数学,它很适合于刻画世界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尤其是无限小变化过程中量与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在边际分析法中,经济变量处在边际状态时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惟妙惟肖地得到刻画。边际分析法是在观察问题的视角、方法和价值观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旧范式都提出了革命性挑战。

2. 马歇尔综合(劳动价值论与边际革命的合题)

西方经济史上的第二次大的综合来自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出版)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该书的基本结构为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构架。马歇尔提出了具有首创意义的“均衡价值论”,使他成为经济学史上第一真正的集大成者。马歇尔综合使得边际主义的革新学说同原本所要反对的英国古典学派的传统相融合。古典学派的客观劳动价值论与边际主义的主观效用价值论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实为对立的两极。前者偏重于供给分析,形成了以生产成本为核心的供给理论;后者偏重于需求分析,形成了以效用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使得供给与需求、卖方与买方、客观与主观等两种力量获得均衡,把原来完全对立的看待世界的基本立足点、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说,马歇尔的综合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三种意义的综合。它使得革命者——边际主义和被革命者——古典经济学从互斥转化为互补,把经济学理论重新团结在“看不见的手”(那是古典纲领硬核之化身)的旗帜下。西方经济学因而推陈出新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革命——到新古典经济学,完成了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

五、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综合

1. 凯恩斯革命:新古典经济学的反题

20世纪3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可是,到了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主要西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投资崩溃、银行倒闭等等。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于是科学革命的爆发势在必行,新范式终究取而代之。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范式革命。“凯恩斯革命”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萨伊定律”作为新古典理论的集中表述首先成为凯恩斯抨击的目标。所谓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思想是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中所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都确信,市场经济中存在保证充分就业均衡趋势的自动调节机制,并赞同萨伊以供给为中心,断定生产供给才

是自变量,消费需求只是因变量。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把主动、被动的关系颠倒过来,提出“需求自己创造自己的供给”(被称为“凯恩斯定律”以及“需求中心主义”),供求和就业量的总水平决定总有效需求,并提出政府调控总需求水平的主张;第二,与上述论点相关联,凯恩斯也否定了“充分就业”信条,承认资本主义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现实;第三,凯恩斯突破传统理论范式,第一次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前者从经济主体的个量分析着眼,后者则从总量分析着眼;第四,在经济政策上,摒弃自由放任主张,主张政府干预,摒弃李嘉图的节约和平衡预算主张,提出了赤字财政政策主张。^①

凯恩斯范式取代了斯密范式,“看得见的手”(萨缪尔森语)一时压倒了“看不见的手”。此后,经济学家在凯恩斯范式的指引下,开始了新的“常规科学”的研究,并且更多地参与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帮助“解决难题”(库恩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50至60年代期间,凯恩斯经济学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

对于凯恩斯革命,马克·布劳格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做过很具体的分析。布劳格在《经济学史中的库恩与拉卡托斯》(1980)一文中指出,拉卡托斯的科学活动的图景要比库恩更为丰富多彩,因此在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演变比如凯恩斯革命时必须将科学革命论与纲领方法论结合起来。布劳格认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纲领的“硬核”中总是包含“理性经济人”的概念,由此推知每一当下的决策对未来结果的影响都存在相当的确定性。然而,当凯恩斯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单个的理性经济人转移到宏观总量分析时,他在纲领的“保护带”里,甚至在“硬核”中,都引入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从而动摇了精确预期的可能性。因此,凯恩斯的经济学纲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硬核”。与此相适应,凯恩斯纲领的“保护带”里也充满着全新的辅助假说:消费函数,乘数效应,自主开支概念,投机性货币需求对长期利率的稳定性所起的作用等等。凯恩斯纲领还有自己的强有力的“正面启发法”,即对付可以预料的反常情况的一系列策略性提示以及从正面贯彻宏观总量纲领的程序性指令,用以指导国民收入的计算和对消费函数和区间乘数的统计估算等等。^②

2. 萨缪尔森综合(即新古典综合: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革命的合题)

萨缪尔森1948年《经济学》首版的问世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第二次综合,被称为“新古典综合”。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并非水火不相容,两者可以实行综合。在萨缪尔森的心目中,凯恩斯经济理论不过是新古典理论的特例,也就是说,前者的理论仅适用于短期的市场不完全性,一旦它帮助后者恢复充分就业假定前提,从长期来看,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再度适用,前者和后者的相对地位因此而转化。转换成经济学方法论的语言来说,凯恩斯的矛头并非真正指向新古典纲领的核心假说,实质上它也未能动摇“理性经济人”的硬核,因此只需调整辅助假说就行了。

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问题上,“新古典综合”认为,适

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再加上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供求的自发调节,早期古典主义的真理就仍然会恢复它的合理性。

因此,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理论看似攻击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杀手”,实为“救命恩人”。这句话很有辩证的意味。“新古典综合”就是将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二者进行“综合”而成。也许用萨缪尔森自己的话来说“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更为生动:“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与物理学家面对电子和光子的波粒二象性所陷入的两难处境是高度相似的。因研究X射线的衍射而成名的物理学家威廉·布拉格曾经建议说,可以每逢星期一、三、五使用粒子理论,而每逢星期二、四、六使用波动理论。以上说法,如果作为对相互对立且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辩证综合的一种概括,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恰当的。然而,作为对科学家陷入两难处境时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则是十分生动形象的。

从辩证的、螺旋式上升的观点看,作为上一轮正、反、合的合题的新古典经济学,又是新一轮正、反、合的起点或正题。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凯恩斯革命——到“新古典综合”,完成了新一轮的否定之否定。

萨缪尔森所概括的新古典综合理论,由于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的二十余年内实践上的成功,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派。然而,1970年代所出现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的并存,这一反例是对新古典综合理论所主张的通膨率与失业率的替代关系的论断的决定性反驳,……这一危机之后,又有了理性预期革命……。

限于本文的目的和篇幅,对往后的经济学革命不再进一步细述。

注释:

[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文版,第1卷,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桂起权、段文辉:《经济科学逻辑论》,“全国经济逻辑创新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7日,天津。

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引言,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文版,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文版,第1册,50、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苏]罗森塔尔:《辩证逻辑原理》,中文版,322~3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文版,第3册,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王自华、桂起权:《对微积分辩证法的认识》,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5)。

汤在新、颜鹏飞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4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①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6、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走向》,载《经济评论》,2002(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Q)